

紀剛
著

滾滾涼河



三民叢刊
144

滾滾遼河

紀剛著

三民書局印行

滾滾遼河／紀剛著．-- 初版．-- 臺北
市：三民，民86
面； 公分．--(三民叢刊；144)
ISBN 957-14-2555-9 (平裝)

857.7

86001258

國際網路位址 <http://sanmin.com.tw>

◎ 滾 滾 遼 河

著作人 紀 剛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
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電 話／五〇〇六六〇〇

郵 摺／〇〇〇九九九八——五號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門市部 復北店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重南店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

編 號 S 85354

基本定價 挪元陸角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2555-9 (平裝)

出版說明

紀剛先生以抗日戰爭時期與其同代青年，於東北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的實際生活經驗，寫成本書；發表於報端時，即感動海內外萬千讀者，委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時，書未上市，即蒙讀者預約至第四次印刷；當年即獲中山文藝獎。繼之，被選為廣播小說，製作電視連續劇，籌拍電影，出版日文翻譯本，成為三十年來長銷暢銷書，已超過五十六次印刷等等，可見本書流傳之廣，影響之鉅。

本書係一有高度歷史真實性的文學作品，對大時代的抗敵工作者遭受日寇之追緝、刑獄、屠殺之慘烈，以及抗戰青年小我感情被壓抑、扭屈、撕裂的痛苦，都有巨細無遺的描繪。作者以劫後餘生的二十餘年歲月，完成此書，將過去完成式的歷史故事，用現在進行式的筆觸，立即引讀者墜入時空隧道，使讀者與書中人物同憤慨、同悲楚、同流血、同流淚，豈止是「感

同身受」而已。書中「生命寫史血寫詩」的歷史見證，「革命誤我我誤卿」的情感告白，亦將永久刻烙於讀者心頭。

據由書外資料得知，作者原是一個被時代洪流沖激而起的一般抗戰青年，終因工作激烈，犧牲慘鉅，乃次第被擢拔為幹部，踏著先行者的血跡，最後接任為參予全面工作領導群的負責人之一。裴有明先生，曾以其在遼陽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經驗，寫作一部「太子河畔」，由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。其工作關係與工作精神相同，工作事蹟只限於一個地區，雖寫得聲色動人、感人肺腑，但有見樹未見林之憾。紀剛先生以其參與東北全面工作之經歷所寫得的「滾滾遼河」，則兼有見樹亦見林的風貌與氣勢。全面抗戰，即人無分男女老幼黨派，地無分東西南北前後方，即連淪陷時間最久，距中央政府最遠的東北地區，也有我們一大片的地下工作。不信？請看「滾滾遼河」！

國史館主修抗戰史的柳長勛編纂，即認「遼河」為一活的歷史，並以書中人物有關的工作回憶錄，輯成一部「東北現地抗日史狀」，列為史乘，以昭永存，並撰序文曰：

東北現地抗日是一種高潔而純真的愛國行為。完全出於這一代人對中國文明捍衛的熱誠和自覺。他們給近代中國史譜下最清白、最悲壯、最辛澀、也最感人的一章。讀他

們底行傳，令人憤惻，令人零淚！

當年奉獻生命，奮身投入這股挽救民族危亡的時代洪流底：有公府將吏，有社會大眾，有政黨成員。惜乎瀋變突發，遼松陸沉。萬里關河，音書阻絕。俟長洋絞翦，倭虜乞降，而政海波翻，京華覆沒。史料散佚，人物凋零。文案既鮮載登，簡冊更無撰錄。坐使垂天正氣，隨龍江之宿霧而同消；亘古精忠，與銀漢之流星而俱燐。言念及此，能不愴感？

用特檢可信筆述數綴，輯成（史狀）。雖橫戈躍馬的風雲懋績難昭；但亦可為志士英姿留鴻影，並對日寇罪行存控訴。

就小說寫作筆法言，以第一身觀點寫作的，「我」不應是主角；「我」是主角時，亦不宜是英雄；「我」若是英雄時，亦不宜自述其過五關、斬六將的英勇事蹟，若然，鮮有不被讀者所摒棄。紀剛先生深諳此理，將自己在書中寫成一個在工作上遭挫折，在感情上受蹂躪的工作幹部，或者說是一位受難的英雄吧！所以才被廣大的讀者所同情所接受。但歷史真實很難完全掩飾，細心的讀者，仍可處處窺見其蛛絲馬跡。

學術界有謂：文、史、哲不分家。一部偉大作品，常包有文學藝術層面、歷史社會層面、

哲學思想層面三者。「遼河」的文學藝術面與歷史社會面，讀者俱可由文本中研賞得知，其哲學思想面則溶於字裡行間故事中，隱而不顯。關於後者，作者曾於允晨出版社出版的「諸神退位」中，分別揭露其端倪，近則完成一部「群我文化觀——做一個完整的人」，由文建會列為人文思想叢書出版，有一個完整的系統的發揚，實際是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價值體系。就文本言，上列雖為三書，就作者生活體驗言，仍是一貫的一部著作。是以讀者若能同時參閱「諸神」及「群我」二者，將對「滾滾遼河」有更深更廣的領悟與收穫。

緣於純文學出版社結束營業，敝局幸有將本書重新排版問世之機會，自當在版本、校對、印刷、裝訂諸方面，力求完美，俾使此一抗戰文學之經典名著恒久流傳。

臨水溯源

——談「滾滾遼河」的去脈來龍



本文為華美經濟及科技發展協會一九八七年年會，中國近代文學組講解。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於舊金山。後並刊載於「聯合文學」四卷六期

「滾滾遼河」這本書，很僥倖地被大家所喜愛，我因此也常常被讀者或記者們，問到一些尷尬而難於回答的問題，所以我就訂立了談話三原則：

一、談書不談人。也就是談作品「遼河」，不談作者我。

二、談書中的工作故事，不談感情故事。

三、必要談及感情故事時，也是從文學層面談，不從歷史層面談。

如今我奉大會邀召，飛越重洋，到舊金山來做報告；我不僅要打破我自訂的禁條，而且要公開承認：這本書的內容，無論是工作故事或感情故事，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實性。唯有一點需要說明的，那就是「書中的紀剛」，是當年的我，而非現在的我。

我以當年在東北從事抗日地下工作的親身經驗，寫下了這本「遼河」，其中自然包括了小我與大我兩方面的情感和兩方面的心願。所以動筆以前就想好了兩句話，預備出書時印在書前的扉頁上。那就是：

謹以此書

獻給那

使我終身感到遺憾的一位少女；

紀念那

將被歷史無情遺忘的一代青年。

這兩句話本是一隻很好的故事鉤，可以鉤住小說讀者的閱讀興趣。但是，由於現實生活中的一點顧慮，我沒有敢寫出來，自然也沒有印在書本上。因為小說家言，到底是真話假說，還是假話真說，讀者是很難分辨的。惹來麻煩的話，作者也是很難分辨的。

這兩句話，雖然沒有寫出來、印出來，在書中卻以另兩句話做了代替。一句是——生命寫史血寫詩，一句是——革命誤我我誤卿。「生命寫史」是工作故事的歷史見證，「革命誤我」是感情故事的時代告白。

二

我寫「遼河」，前後分四個階段：最早是「葬故人」，其次は「滾滾的遼河」，再次は「愚狂曲」，最後は「覺覺團的故事」。發表時，選用「滾滾遼河」為書名。

一九四六、也就是民國三十五年春，抗戰勝利不久，東北雖然尚未完全接收，但大局看好，遠景光明。關於工作方面的事，都存在於東北同胞的耳目之中，社會證實它，國家肯定它，一切犧牲奮鬥，都有方法來善後。祇有感情方面的事，許多青年同志們，都有「斯人獨憔悴」的困境。紀剛那似曾愛過而又未嘗愛過的兩個女孩子，一位是宛如，已經琵琶別抱，一位是詩彥，又讓給了朋友。所以我寫「葬故人」，把她兩捏在一起寫死了，讓她們在紀剛

的心中死了，以便他能走出過去，追求新生。那時，我就用「革命誤我我誤卿」給女主角做碑文、做墓誌銘。「葬故人」寫了一半便因故停筆，我在「遼河」書中說：「土埋半截便無下文了」。其實這是一隻伏筆，是一句賣關子的話——土埋半截便是故人未死，故人未死當然還有下文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與內人雙雙來到臺南，物質生活雖然艱苦，小我感情卻十分平靜，可是每一想到東北又再遭巨變，我們那段奮鬥史，即將被另一個時代所淹沒，心中實有未甘。於是立志寫「遼河」，寫大我的故事，以便為「那些年、那些人、那種種鐵的生活、火的情感、血的工作」做紀錄。當時我是用「六壯士」、「鐵流」、「最長的一日」等類似的筆法，祇以「工作故事」推展小說情節。可是由於我文學功力不足，越寫越沒有勁道；加上個人的職業變動，生活忙碌，便又告停筆。

一九五六年，我從臺南到臺北的臺大醫院進修小兒科，一時又回到見習醫師的身分。臺大醫院的建築格式，又太像我母校的實習醫院。走在中央走廊上，那些從身邊滑過去的年輕漂亮的小護士們，又個個像我的小宛如。正當我墜入時光隧道精神恍惚的時候，又聽到了詩彥的最後消息。這消息給我的刺激太大，我一個人承受不了，便找來兩位朋友，在總統府旁的一間小咖啡館裡，向他們訴苦。其中一位是已過世的民族音樂家史惟亮先生，在書中我用

了他的本名。他對我很感動地說：「天下真情不過一兩，老兄何幸獨得三分！」另一位是對我寫小說一向大澆冷水的吳尹生先生，在書中的角色，他是「伊正」的一部分。這次他又冷笑三聲對我說：「談什麼真情一兩？簡直是愚蠢與狂妄！有人愛你的時候，你竟渾然不覺，是何等的愚蠢！？一個人祇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愛，沒有權力決定別人的愛，你們竟在長春背地裡把人家給平分了，又是何等狂妄！」我原希望他也能給我一點同情，卻不料反遭他一頓痛罵。於是我就決定用他罵我的話，寫「愚狂曲」向他申辯，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們申辯。難道說，這種大時代裡小我的大不幸，這種「革命誤我我誤卿」的無奈與悲情，竟然祇是一曲愚狂？

「愚狂曲」是以感情故事為主體，工作故事為陪襯。由於構想的結局太悲慘，可能給我帶來另一種不幸，所以寫了十萬字，就不敢往下再寫了。因為書中三位女主角，都有一句要命的話。宛如說：「大哥，你活著回來，不如你死去！」詩彥說：「我愛的是你，你為什麼把我向別人身上亂安排！」甄青說：「跟你含辛茹苦生活了許多年，還不如你心中的一條影子！」甄青說完這句話，便舊病復發。在現實生活中，為了一部小說，寫瘋了一個人，那可不是普通的愚蠢！

一九六五、也就是民國五十四年，我們來臺的抗日地下工作同志，曾舉行一次「五二三」

蒙難二十週年紀念會。當時曾照相留念。當我面對團體照片的時候，心中常有一種奇特的感觸。先是感覺到：「有的人實在死得太早，空落得個烈士之名；有的人實在死得太晚，不然也獲得個烈士之名。」後來又感覺到：「在當前整個大時代裡的中國人，有太多的人死得太冤枉，有太多的人活得實在太窩囊。」在這種無限滄桑和奇特的感觸下，我又發狠，寫「覺覺團的故事」。這一次是「感情」與「工作」同為主題：就工作故事言，感情故事是它的興趣線；就感情故事言，工作故事是它的時代背景。這一次總算寫完寫成了。

這一次的原稿比較更小說化，工作故事比較誇張一點，感情故事也更渲染一點。可是經過兩位特殊讀者的審核和其他朋友的建議，加以大殺大砍後，才推出現在這本「滾滾遼河」。

三

一般作者寫小說，常常是苦於資料太少，在如何虛擬人物、構想故事方面大費心血；我寫「遼河」，反倒是苦於資料太多，在如何選擇人物、虛化事實方面大傷腦筋。因為工作故事寫假了，工作負責人不同意；感情故事寫深了、寫重了，另有人感到不舒服。我寫「遼河」，本來是想寫成一部小說，不是一篇散文、一首詩或一則報導文學；寫小說的目的卻是想記錄一段歷史，而且「向讀者負責所述歷史的真實」。「遼河」發表後，它的歷史性被接受、被肯

定了，它的小說性文藝性，似乎尚有待研究。因為許多反應性的文字，都是讀者對抗戰生活
的感性感言，很少有理論家對它做文學性的批判。所幸今年七月，為紀念抗戰五十週年，在
臺北舉行的兩場文學的研討會裡，都討論到遼河。師大張素貞教授提出一篇「從浪漫到寫實
——談『未央歌』與『滾滾遼河』的創作模式」。在這篇論文裡，她對遼河做了許多文學性
的分析，是我這個閉門造車者，多年來很少聽到的「知己的聲音」。高陽先生在另一場講評
裡，特別指出遼河第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等三章，關於紀剛在獄中三次自殺的心理描寫，
是本書最成功、最有價值的地方。可是，在我修稿時，有人建議將這三章完全刪去，因為這
三章裡沒有一點點感情故事，怕讀者沒有興趣讀下去。可見作品的評價，也常是見仁見智，
差距很大的。

「滾滾遼河」推出後，許多文壇先進和熱心讀者，都鼓勵我、期待我的第二部作品。可
是我沒有。我也常常反省，「遼河」雖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，我自己卻不是一個純文學的人。
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有人說我是一一無怨無尤而有所堅持的人；有人說我是一一大時代的大
不幸中，一個小小的幸運者；有人說我是一不自量力，妄想爬大山的人。我自己想，這些批評，我可能都有一點。

我出生在遼寧省遼陽縣鄉下的一個農家，按著我們大家庭的家規，男孩子小學畢業後，

就要下地種田或放豬放牛。剛巧我小學快畢業那年，就發生了「九一八」事變。九一八後，東北有一段無政府時期，鄉下盜賊蜂起，地方混亂不寧，有田地有財產的人，都把小孩子和婦女們送到縣城裡來避難。在城裡，我無田可種無豬可放，祇好就便升學。可以說「九一八」事變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，卻給我變出一個升學讀書的機會；不然的話，我現在可能還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莊稼漢。

在瀋陽讀高中的時候，我對人生發生了問題，很想讀心理學或哲學。可惜「滿洲國」當時不設立文史哲科的綜合大學，只設立農工商等專科學院。我選讀了遼寧醫學院，一方面是基礎醫學課程，可以使我先獲得關於人的生理學的知識；一方面也符合我家長對子孫的期待。因為學醫比較有職業保障。所謂「此處不養爺，還有養爺處；處處不養爺，回家開藥舖。」

「七七」以後，我們就在東北參加現地的地下抗戰工作。當時青年同志們的心理，沒有人想到還能夠活下來，所以在獄中我還對審訊的敵特做了一首打油歪詩，以明心志：「年年南北走風塵，敢將大業寄此身，頸上頭顱任君取，沖霄壯志萬古存」。不幸，當年沒有機會作「烈士」，卻在海外偷生的日子裡，做了個浪得虛名的「文士」。

「遼河」的原稿雖然幾經修改，在報紙發表時，我仍接受「仲父」的建議，把勝利後對政府接收工作的批判部分，又刪掉了很多。出書的時候，林海音先生說她的出版社不怕什麼，

希望我把刪掉的部分再加進去。王藍先生也勸我，要我拿出道德勇氣，把應該說的話都說出來。但，報紙發表後，我心中已沒有寫稿時那樣的悲憤，而當時正好看到一部美國西部片，片中描寫西部農民為反對修築鐵路而用武力抵抗。鐵路公司請來聯邦騎兵隊加以「鎮壓」。農民們看到騎兵隊那面星條旗，便自動撤退了。他們說：「我們當年曾為這面旗犧牲流血，今天，我們怎能對它開槍！」這句話使我深受震動。我想，政府由南京撤退到臺北，已經承受了「歷史的裁判」，我不願別有用心的人，在它痛定思痛，復興圖強的時候，利用我的文字做為他們攻擊的武器。

其實我所刪掉的，祇是些情緒性的言語，那些真正檢討批評的意見，都像一支支的鋼針，仍保留在藏針的針插裡面，粗心的讀者或鈍感的官員，感覺不到它的刺痛而已。

四

關於抗戰勝利後中國歷史的大不幸，我們當代的中國人都有責任檢討思考。「滾滾遼河」裡有幾句話問道：「為什麼辛亥革命成功，又有軍閥割據？為什麼北伐完成統一，又有外敵入侵？為什麼抗戰勝利，又有國家分裂？」這些話在書中，祇是前後文間的一段小過門，卻是我個人二十年來晝夜思考的問題。據我自己粗淺的結論，其主要的原因是現代的中國人出

了問題，是現代的中國文化出了問題。怎樣拯救現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呢？……正當這個時候，有一位雜誌社的代表來訪問我，問我一個極有深度的問題。他說：「同樣是從事地下抗戰工作的抗暴文學作品，為什麼『滾滾遼河』裡的青年，那些覺覺團弟兄們的思想，都是向人性的上限發展，把一切個人的理想希望，都寄託在國家民族的大群上；而法國沙特的作品，卻是向人性的下限發展，退縮到以赤裸裸的個體，面對非常的暴力？」這位代表，以前我不認識，他給我的名片印的是另一個名字。事後我才知道，他就是我久已聞名而今天也應邀在座的陳映真先生。

陳先生走後，我想他的問題既然是由「遼河」而來，我也就跳出作者身分，改以讀者或研究者的立場，重新閱讀「遼河」。我一口氣，連看了三遍。啊哈！在「遼河」的第十六章裡，我不僅為他的問題找到了答案，也為我自己晝夜思考的問題找到了答案。我的答案不一定正確，但陳先生的問題，實在問得太多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公開這段往事，所以也藉機在這裡公開向他說聲謝謝。因為在臺灣，我們等於沒有再見面。

我寫「遼河」，祇是忠實地將那個時代青年的「思想言行」記錄出來，並沒有故意把什麼「意識觀念」包裝進去。當我以研究者的立場分析「遼河」時，才發現覺覺團弟兄們行為動力——一方面是歷史環境的驅使；一方面是中國文化的實踐。他們所實踐的，是中國傳